

書名：《先秦兩漢宗教文學史》

作者：劉湘蘭

出版：北方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8月

頁數：524頁

中山大學劉湘蘭教授的大作《先秦兩漢宗教文學史》於2023年8月由北方文藝出版社付梓問世。該書是劉湘蘭教授十二年來研究心血的結晶，對先秦兩漢時期宗教文學作了全面梳理，在宗教文學研究領域中具有重要的指標性意義。

先秦兩漢既是文體的發生時期，也是本土宗教的萌芽階段，宗教與文學的互動亦千頭萬緒，紛繁複雜。《先秦兩漢宗教文學史》的研究範圍確定為“涉及原始宗教的儀軌、宗教思想、宗教實踐且具有文學審美價值的先秦兩漢文獻及學說思想為後世道教所接受的諸子文章”，探討此類文獻所具有的宗教文學特色、審美價值及對後世道教文學所產生的影響（頁1—2）。全書除緒論和結語外，按照大致的時代順序分為十四章，分別對《尚書》、《山海經》、《周易》、《老子》、《莊子》、《詩經》及楚辭等先秦典籍，以及秦漢詩賦、《淮南子》、《列仙傳》、老子神話、漢代讖緯、《太平經》及《周易參同契》等相關秦漢文獻作專題討論，幾乎涵蓋了先秦兩漢的重要文獻。除了按時代順序安排章節之外，還有兩條研究進路貫穿書中：一是先秦兩漢的文獻如何記載、書寫原始宗教、巫術儀式和神話故事，一是早期道教如何基於先秦文獻建構自身的神話體系和文學表達。

一方面，在先秦文獻中，原始宗教信仰衍生出的大量神話故事，為道教文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本書的第二章從甲骨卜辭談起，深入探討了《尚書》中神話與歷史的交融，並借助《金縢》、《盤庚》等篇章，揭示了《尚書》獨特的敘事藝術。第三章則聚焦於《山海經》，將其視為“遠古的巫書及與神話集”，進一步

深入解析了其中的古帝神話、崑崙山神話和日月神話，特別強調這些神話與原始宗教中巫祭儀式的緊密聯繫。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別探討了《詩經》和楚辭中的神話元素。這兩者作為中國詩歌的源頭，深受上古社會巫風盛行的影響，祭祀儀式和神靈傳說成為其歌詠的主題。楚辭中的《遠遊》啟發了後世遊仙文學的靈感，而第八章所探討的秦漢遊仙詩賦正是這一傳統的延續。第九章則聚焦於《淮南子》，深入剖析了其中神話的流變。書中的一些神話故事對後世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劉教授以女媧神話和嫦娥奔月神話為例，通過細緻的解讀，展現了《淮南子》神話的文學價值和歷史地位。

另一方面，道教在先秦兩漢的文獻典籍中汲取了豐富的養分，並對其進行了宗教性的改造、闡釋和發揮。在此基礎上，道教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理論體系和書寫特色，為後世道教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書的後半部分，基本是圍繞這一歷史過程展開。在第十章中，劉教授討論了《列仙傳》與漢代仙人碑傳，以出土文獻為補充梳理了道教仙傳的早期發展。第十一、十二章則以《老子指歸》、《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老子想爾注》、《老子變化經》和《老子銘》為研究對象，梳理道教對老子的神聖性建構，以及相關文本的文學特色和宗教意義。第十三章關注了漢代的讖緯，認為讖緯“逐漸從經學中脫離出來，與方仙道、黃老道緊密結合演變為早期道教”（頁 398）。讖緯學說中的知識和神仙學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啟發了道教理論的發展成熟。第十四、十五章分別討論了道教早期經典《太平經》和《周易參同契》。劉教授肯定了《太平經》在文體發展方面的價值，並深入分析了其中的文學思想，同時也著重強調了《周易參同契》“隱喻”的創作手法及其對後世丹書的影響。

先秦兩漢的文學與宗教歷來是學界研究焦點，研究成果也極為豐富，然而全面性、系統性的通論著作並不多見。劉著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深入剖析了這一時期宗教文學的複雜面貌與文化價值，其創新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該著在凸顯文體本位的同時，亦借鑒了文化人類學的視角。早期文體的形成與宗教活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吳承學教授曾指出：“早期文體由於其形成多與禮儀、政治及社會活動相關，受儀式以及該文體獨特功能之需要

的影響，而導致特定體式的重複出現”。¹ 例如甲骨卜辭等早期文獻，就是對原始宗教活動的記錄，並呈現出一定的文體形態。同樣，韻文文體的形成與原始宗教祭祀活動息息相關。作為古典詩歌濫觴的《詩經》和楚辭，其中不少作品脫胎於祭祀活動中的樂歌，並且其取材深受當地盛行的神祇信仰影響。秦漢時期遊仙主題的詩賦，也與漢代官方的祭祀儀式和宗教活動緊密相連。涂爾幹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書中，將宗教劃分為信仰和儀式兩大基本範疇。同樣，先秦兩漢時期中國文學的發生發展就與宗教生活的這兩個範疇密不可分。祭祀儀式推動了文體形態的形成和發展，同時，信仰（以及神話）作為這一時期文學表達的核心內容，與文體相互影響，共同塑造了中國宗教文學的雛形。該著對《山海經》、《詩經》、楚辭、秦漢詩賦的探討，均圍繞這兩個核心問題展開。另外，兩漢時期，隨著文體的發展，早期道教經典也逐漸呈現出更加成熟、多元的文本形式，該著以《太平經》和《周易參同契》為例進行了分析。劉教授認為，《太平經》已存在相對成熟的七言詩，對後世遊仙詩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周易參同契》則包含了三言詩、四言詩、五言詩、騷體辭賦等多種文體，呈現出文體雜糅的文本形態，強化了丹書的神秘性，又提升了五言詩的社會地位，具有重要的文學和文獻學價值。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太平經》還是《周易參同契》，編撰者對文體的選擇都是出於明確的宣教意識。七言詩和五言詩在當時均已較為流行，且朗朗上口，便於記誦，故而成為傳播教義丹法的最佳文體。《周易參同契》的語錄體也更適合詮釋教義，方便讀者理解。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展現了宗教與文學的互融。

第二，該著深入探討了道教文學理論的淵源，並強調了宗教本位的文學觀。如果說兩漢讖緯學說對《詩經》的詮釋是為經典賦予神秘性，那麼《太平經》就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以道教的宇宙觀詮釋“文”的生成，形成了一套自成體系的道教文學理論。該著第十四章的第二節討論了《太平經》以“文氣”為核心的文原論。值得注意的是，《太平經》中的“文氣”與文學史上曹丕的“文氣”說並不能簡單地相提並論，曹丕的“文氣”說強調作家的氣質和個性對

1 吳承學，李冠蘭：《論中國早期文體觀念的發生》，《文藝理論研究》，2016年第6期，頁105。

作品風格的影響,而《太平經》則是通過道教的宇宙觀來解釋“文”的起源,並借用了先秦道家哲學中的“氣”,形成了一套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文學評判標準。好的“文章”、“文辭”或是神道的外在顯現(“神者,道也。入則爲神明,出則文章,皆道之小成也”²),或是天地之氣的自然流露(“故古詩人之作,皆天流氣,使其言不空也”³);背離“天道指意微言”的則是“邪言邪文”。這套評判標準並不僅是出於文學審美,也透露出對宗教秩序的強調和維護:“邪僞文多,則邪惡氣多,故人多病而不得壽也。此天自然之法也。夫文辭,天地陰陽之語也。故教訓人君賢者而救戒之,欲令勤行致太平也。”⁴《太平經》中將書劃分等級:“一曰神道書,二曰覈事文,三曰浮華記。神道書者,精一不離,實守本根,與陰陽合,與神同門。核事文者,核事異同,疑誤不失。浮華記者,離本已遠,錯亂不可常用,時時可記,故名浮華記。”⁵基於此標準,《太平經》對其時流行的一些“文章”、“文辭”予以批判,而其所推崇的自然是符合道教教義教理的“真文”、“正文”。也許可以說,《太平經》所確立的道教文學理論,並不只是出於品評時文、糾正文風的文學考量,更是爲了彰顯道教教義,維護道教經典的合法性,最終仍是服務於宣教的旨趣。該著中對《太平經》的深入討論,也爲理解這一時期的道教文學理論提供了新的視角。

最後,在研究材料的選取上,劉教授不僅關注傳統的文獻資料,而且特別注重新材料的發掘和運用,如第十章中對漢代仙人碑傳的討論,便充分體現了這一點。以往對六朝仙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列仙傳》和《神仙傳》等經典上,仙人碑傳等出土文獻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也較少被納入宗教文學研究的視野。從《列仙傳》到《神仙傳》之間,時人如何通過文字記述描繪神仙人物,似乎存在著一段空白。而《仙人王子喬碑》、《肥致碑》和《仙人唐公房碑》這三篇保存完整、以仙人爲傳主的漢代碑傳提供了關鍵的線索。從文體學的視角來看,碑誌與列傳異曲而同工。正如仙傳源於史傳而異於史傳,仙人碑傳也具有不

2 王明;《太平經合校》,(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734。

3 同上,頁178。

4 同上,頁140。

5 同上,頁9—10。

同於一般碑傳的文體特徵。劉勰論碑文，言“寫實追虛”，而劉教授則從中延伸出“徵實追虛”的概念，精準提煉出這三篇仙人碑傳的文體特徵：所謂“徵實”，與“寫實”不同，是要徵求真實；所謂“追虛”，則是要刻畫出傳主作為仙人的出塵風度和仙幻法術。此外，劉教授也細緻地考察了漢代仙人碑傳與《列仙傳》及《神仙傳》之間的傳承關係，指出漢魏六朝時期仙傳的發展是連續的進程，“仙人碑傳在仙傳敘事的傳承起了重要的橋樑作用”（頁 324）。當然，劉教授並未誇大三篇仙人碑傳在宗教文學史上的意義，而是通過對《肥致碑》和《唐公房碑》的文本分析，指出碑文中“詩意與修辭要素”對情節描述的影響，以及它們如何對道教仙術進行“宗教性闡釋”，從而形成仙傳的文學風貌。

綜上所述，劉教授的研究成果獨樹一幟，令人矚目。若論遺憾之處，筆者有兩點淺見：首先，道教文學的顯著特點之一是其深奧的、極具隱喻性的宗教語言體系，這一語言體系應是在先秦兩漢時期開始形成，隨著道教世界觀、修行理念和神仙理論的發展而漸臻成熟，並在後世的道教文學中衍生出獨特的美學風格。儘管該著在討論《周易》卦爻辭、讖緯文學、《周易參同契》時都或多或少有所涉及，但並未留太多篇幅討論這一宗教語言體系的生成機制和形成脈絡，不免讓讀者感覺意猶未盡。第二，道教立教於東漢末年，該著以先秦兩漢為研究時段，定位是“道教文學史的淵源篇”（頁 1），即以道教文學的形成作為旨歸，將上古時期的原始宗教、信仰和神話視為道教文學的淵藪。這種研究視角無疑有助於我們理清道教文學的起源。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是否會造成視野的遮蔽？值得進一步思考。當然，一部論著受限於篇幅和架構，難以做到面面俱到。總體來說，《先秦兩漢宗教文學史》是一部極具學術價值的著作，為宗教文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學術知識與思考空間。

（作者：浙大城市學院講師 程瑜瑤）